

# 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胡 玲 何日取

16-17 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强了天主教的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耶稣会 教育 天主教革新运动 新教

作者胡玲，1977 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淮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何日取，1969 年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着整个基督教，因而是一个影响遍及各阶级、公共及私人生活的社会团体”<sup>①</sup>，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甚至垄断性作用。但到 15、16 世纪，这一地位受到了挑战。天主教自身的腐败和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民族意识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最终催生了宗教改革，天主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16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不仅失掉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量地盘，即便是在控制较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新教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当时意大利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妇女，都很同情新教，到 1535 年，罗马本土已有三万名新教信徒。以致后来的枢机主教皮埃尔·卡拉法对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1534-1549 年在位）说：“整个意大利都被路德派的异端所传染，它受到政治家和教会人士的广泛拥护”。<sup>②</sup>

诞生于天主教会举步维艰之时的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本着“愈显主荣”的根本宗旨，建立伊始就参与了天主教革新运动，成为天主教复兴的中坚力量。耶稣会之所以能与代表历史潮流的新教抗衡，并在天主教改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开办教育无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后来的历史表明，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在欧洲的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本文欲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早期耶稣会教育在天主教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sup>①</sup> [德] 爱德华·傅克斯著，侯焕阁译：《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9 页。  
<sup>②</sup> 吴鹤鸣：《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9 页。

## 一、洁净教士，培养神职人员，为天主教复兴提供人才基础

作为天主教会内部的新生力量，耶稣会意识到教会上层和普通教士的腐化对天主教生存根基的侵蚀，认识到天主教要实现复兴，必须整肃内部，洁净教士，重塑形象。早在罗耀拉时代，被派往德国的会士彼得·法伯尔（Peter Faber, 1506-1546）在给罗耀拉的信中非常客观地指出了宗教改革的社会原因，他说：“认为路德宗仅仅通过他们错误的教义就使如此众多的人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这是不真实的。这种情况更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教士。在沃尔姆斯，即使只有两三个教士没有公开地非法同居或陷入其他的罪恶当中，上帝都会为之高兴。”<sup>①</sup>德国的情况，“不是对圣经的误解，不是华而不实的论战，不是布道和劝诱的路德派……而是教士们臭名昭著的生活。”<sup>②</sup>法伯尔认为在采取使路德派信徒“浪子回头”的任何措施之前，首先应该彻底洁净天主教教士。<sup>③</sup>此后，耶稣会著名教育家、理论家、“德意志使徒”圣彼得·迦尼修（Peter Canisius, 1521-1597）也认识到皈依的主要障碍是当地教士生活放荡、愚昧无知和缺乏责任感。在耶稣会士影响下，特伦托宗教会议（1545—1563）最终将天主教会内部的整肃提上议事日程，通过了一项关于教士生活守则的综合法令。同时，认识到教育在内部整肃中的重要性，规定教士应在主教管理的神学院中精心地接受关于神学、灵性和生活法规方面的训练。<sup>④</sup>

在特兰托会议后的天主教内部整饬中，这一法令得到了较认真的贯彻，耶稣会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当时的整饬“主要从新的教团（耶稣会、方济各会）、教皇使者和起初数量不大的一批主教以及高级的和一般的教会官员开始，涉及面慢慢扩大，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批可靠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区主教和副主教、大教堂主教、代理主教和未受影响的传教士”。通过整饬，“不称职的神职人员、还有信奉新教的官员被逐出教区、修道院和大教堂；情妇被赶走，非天主教的书籍被焚毁，种种豁免和不利于教会生活的特权被废除；当局和主教命令采取严惩的办法迫使教士放弃圣职买卖、不暴饮暴食和穿戴世俗服装”。另外，耶稣会还通过高效的教育制度为天主教造就了“一支经过神学培训和具有宗教责任意识的神职人员”<sup>⑤</sup>，提高了神职人员的素质，为天主教的复兴提供了人才基础。

首先，耶稣会教育为天主教会培养了大量的高级神职人员。1548年耶稣会成功创办墨西哥学院，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耶稣会学校在欧洲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sup>①</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New York, 1984, P110.

<sup>②</sup> 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Edinburgh, 1934, P558.

<sup>③</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111.

<sup>④</sup> R. B. 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sup>⑤</sup> 以上见〔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67页。

来。这些学校多具有优良的师资、严格的管理和较高的教育质量，他们培养的人才受到了罗马教廷的青睐，很多人进入了教会上层。1621—1676 年间的罗马教皇大多在耶稣会学校受过教育或者选耶稣会士作为自己的忏悔神父。在为天主教会输送高级教职方面最为突出的是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罗马学院创办于 1551 年，建立之初即享有盛名。1581 年蒙田参观了罗马，他在《游记》中写道：“在基督教世界中，这所大学是一个奇迹，……它是伟大人物的摇篮。”<sup>①</sup>在建立后的 5 个世纪中，罗马学院为天主教会培养了 6 位圣徒、30 位接受宣福礼者，12 位教皇和几百位主教、红衣主教，被称为“教皇的学校”<sup>②</sup>。日耳曼学院于 1552 年创办于罗马，当年罗耀拉在给巴伐利亚会士克劳迪·勒·杰伊（Claude Le Jay）的信中说，日耳曼学院“将承担对被选的好品行青年（他们承诺献身于基督徒的虔诚和美德）的教育和道德培养，当他们在学业和德行方面取得值得赞扬的进步时，将被送回德国并给予牧师的有俸职位。当然，那些在德行上有明显特殊成就的人将被提升到主教乃至更高职位”<sup>③</sup>。正如罗耀拉所期望的，日耳曼学院的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主教或帝国教会的领袖人物，到 16 世纪末，日耳曼学院学生已掌握了萨尔茨堡、布雷斯劳、奥尔米茨、奥格斯堡、的里雅斯特、维尔茨堡、帕绍等地区的主教职位，被称为“主教的工厂”<sup>④</sup>。这一称号一直维持了 200 余年，1560—1803 年，德国约有 18% 的主教毕业于该学院，地近罗马的奥地利更有 30% 的主教职位被该学院毕业生控制。在日耳曼学院毕业生控制下的南部德国和奥地利，成为天主教复兴和阻扼新教势力南下的重要阵地，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民众仍多信仰罗马天主教。

其次，耶稣会教育为天主教会培养了素质较高的普通教士。对罗耀拉来说，发展教育事业是洁净天主教教士的重要手段。1554 年 8 月，罗耀拉指示第一位德国籍会士彼得·迦尼修：“帮助天主教的另一卓越方法是增加耶稣会的学院和学校”<sup>⑤</sup>，明确要求迦尼修创建学校，对小孩和青年人施以拉丁语和天主教教义教育，培养未来的教士。1555 年，迦尼修在因戈尔施塔特建立了一所学院，随后又在科隆、布拉格、因斯布鲁克、慕尼黑等地建立学院，培养高质量的新教士。经过 31 年的不懈追求，到 1580 年，迦尼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 18 所学院处于他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之下，约 1100 多名会士忙碌于这个帝国的教育事业。

不仅德国，其它地区的耶稣会学校在培养教士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建立了专门培养教士的附属学院，成为最早的培养教士的国际性机构。罗

<sup>①</sup> Robert Birdey, *The Refresh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New York, 1999, P137.

<sup>②</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116.

<sup>③</sup> Martin D. 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7-148.

<sup>④</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New York, 1984, P118.

<sup>⑤</sup> Martin D. 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146.

马学院为教士的培养选用最优秀的教师，制定的规章制度和选用的课本也成为其它学校的标准和典范。<sup>①</sup>日耳曼学院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德国和‘被异端影响’的北欧其它地区如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作为未来主教区教士的青年提供教育”<sup>②</sup>。克劳迪奥·阿奎维瓦（Claudio Acquaviva, 1581-1615 年在任）任会长时，耶稣会曾被授权在任何大学建立神学学校。<sup>③</sup>这样，继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后，其它耶稣会大学也纷纷仿效，建立了培养教士的附属学院，如 17 世纪早期的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大学，为来自三个不同主教区的学生设有三所“神学院”。虽然特兰托会议决定建立教区神学院，培养教士，但由于许多主教未能认真执行该规定，耶稣会学院实际上取代了教区神学院，<sup>④</sup>成为“真正的、出色的神学院”<sup>⑤</sup>，真正承担起培养教士的责任。为尽可能地利用资源，加强教士的培养，耶稣会士也大量涌入非耶稣会大学讲授哲学、神学课程。如 1561 年，会士接管了特里尔大学的哲学和神学系，从 1560 至 1575 年，三位会士在科隆大学教授神学。

为培养忠诚于天主教的高素质教士，耶稣会学校根据教士工作的需要精心设置了神学院的课程。1563 年起，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开设了“道德论辩”（cases of conscience）课。这一课程不仅强化了未来教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也使道德神学（Moral Theology）成为神学课程的一个独立分支。为培养教士成为出色的传道人，耶稣会除开设了文法、修辞等训练口才的课程，还自创了一种特殊的教材——“教诲性信件（Edifying letters）”。这些信件是各地传道团每年向罗马总部递交的传道情况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吸收的新成员、皈依人数、听忏悔次数等，也记载一些奇事，如神迹般的存活、成功驱除魔鬼。罗马总部在阅读后，将这些信件送往大学，作为传道的范例教育学生，用实际事例坚定学生信仰，强化耶稣会的神圣使命，同时也传授了传道技巧。面对人文主义思想和新教的侵蚀，耶稣会教育更加注重对天主教信仰的论证，增强教士信仰与道德的坚定性。第三任会长弗朗西斯科·德·博加（Francisco de Borja, 1565-1572 年在任）明确地宣称：“虽然异端和谬误有悖于天主教真理，但讲坛上的传教士不要轻率地、无选择地攻击它们……，努力论证天主教信仰、并以其它方式反击错误才是天主教徒的责任。例如，当时机到来时，他应服从罗马教会；以圣经章节和辩论坚持贞洁、教士的独身；列举虔诚生活、虔诚男女的回报；细想善功和赎罪的价值；激励人们服从君王和主教。”<sup>⑥</sup>

耶稣会培养教士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到 17 世纪前期，天主教教士的质量有了明

<sup>①</sup> John W. O' 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4.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J. C. H. Aveling, *The Jesuits*, New York, 1981, P200.

<sup>④</sup>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3.

<sup>⑤</sup> John W. O' 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237.

<sup>⑥</sup> Frederick J. M. Ginness, *Right Thinking and Sacred Orator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8.

显提高，对天主教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这些人肩负了恢复天主教的主要重任。……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以巨大的勇气吸引着新教徒重返天主教的行列，并且做了一件同样必要的工作，即教育和增进了传统的、但是不热心的、或者丧失了勇气的天主教徒的信仰”。<sup>①</sup>如毕业于科隆耶稣会学院的符茨堡主教尤利乌斯·埃希特·冯·米斯佩尔布鲁恩就是一位热诚的天主教徒，他一直活到 1617 年，在任期间，以铁腕统治符茨堡、驱逐异端的传教士，压制牧师会成员要求参加政府的希望。他长期统治的特征是“天主教得到明显的复兴，以及通常认为由于他的德政而带来的种种繁荣”<sup>②</sup>。

总之，耶稣会教育通过宗教人才的培养为天主教输送了新鲜血液，“一代新的信徒和受到教育的天主教徒逐渐形成，从他们中间，在适当时候可以选拔很多热心的教士和主教从而着手按特伦托会议上神父们的精神恢复教区生活。到 16 世纪的最后 25 年，天主教的复兴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对异端进行最后的打击。”<sup>③</sup>

## 二、培养政府官员，影响世俗政权， 为天主教复兴提供政治保障

耶稣会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培养了素质较高的神职人员，也为世俗政权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人才。当时，许多国王、诸侯、官员是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最著名的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 年在位）、巴伐利亚公爵马克希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597-1651 年在任）、法国首相黎塞留和马萨林等。这些毕业生在掌握了世俗政权以后，大都执行了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维护了天主教的地位。有的甚至通过行政、军事手段，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利益，为天主教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

1590-1595 年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接受耶稣会教育的斐迪南二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发誓：宁可放弃他的国家和统治也不放弃他的信仰”。1596 年，成为奥地利大公后，他“按照复辟天主教的精神治理他的国家。据说他每天两次出席弥撒，乐于了解忏悔、殉难和圣徒的奇迹，并且恪守教规，这表现于外表的虔诚，但也表现为严格履行宗教的服从”。“他同自己前任的那种准备让步和不明朗的宗教政策和对内政策决裂，有效地促成建立一种以君主为首的天主教国家制度”。这种做法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奥地利的复兴，而且“为奥地利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创造了前提”<sup>④</sup>。

斐迪南不仅影响了奥地利的宗教信仰，也影响了德意志的其它邦国。1617 年，他出任波希米亚国王伊始，立即破坏并欲取消德皇鲁道夫二世在 1609 年大诏书<sup>⑤</sup>中允诺

<sup>①</sup> R. B. 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 83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455 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 436 页。

<sup>④</sup>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第 203-204 页。

<sup>⑤</sup> 德意志皇帝鲁道夫二世是一个虔诚的耶稣会士，在任期间，曾试图通过高压政策迫使波希米亚新

的信仰自由政策,着手打击和迫害波希米亚的新教势力,激起波希米亚新教贵族的反对,触发了三十年战争。1620年,斐迪南二世在天主教联盟的帮助下,取得白山战役的胜利,并“使用暴力恢复了天主教,在许多地方导致信奉新教的居民大量流亡”。“白山战役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涉及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德国。波希米亚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状况经历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变化”<sup>①</sup>,今天捷克的宗教信仰仍以天主教为主。1619年斐迪南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继续贯彻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政策。1629年颁布“归还教产敕令”,规定一切被异化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都恢复天主教礼拜,归还一切自1555年后充作俗用的直属帝国的修道院和一切自1552年起被新教徒占有的领主所属教会财产。“归还教产敕令”不仅重振了天主教的势力,而且“使天主教复辟最广泛地向北德中部推进”<sup>②</sup>。

与斐迪南二世同时代的巴伐利亚公爵兼选侯马克希米连一世,也是耶稣会学校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学生。1597年继任巴伐利亚公爵后,立即修订法典,整顿军队,加紧对国内和教会的控制。为对抗以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首的新教联盟,1609年2月,马克希米连一世组织天主教联盟,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方面最强有力的人物”<sup>③</sup>。1614年,促使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夫冈·威廉改奉天主教。1619年,支持奥地利打败波希米亚新教国王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此后天主教联盟又征服了上巴拉丁,取得了对整个巴拉丁领地的控制权,作为德国新教堡垒的巴拉丁领地遭受严重破坏。1623年,又乘胜攻占了新教诸侯控制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萨克森地区。马克希米连一世取得了选侯资格,占有了上巴拉丁地区,并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了确认。马克希米连一世的扩张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对于天主教在南部德国的复兴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为世俗政权直接培养人才之外,耶稣会还通过其它方式影响世俗政权对天主教的态度。在这些方式中,教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耶稣会教育活动本身影响了世俗政权的宗教态度和宗教政策,推动了天主教的复兴,这一点在巴伐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宗教改革运动之初,新教在巴伐利亚曾得到广泛的响应。但随着耶稣会教育活动的开展,新教在巴伐利亚的传播遭到了挫折。“自1548年起至1773年,耶稣会士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拥有决定性的影响,促进了研究工作,并为反对新教教义的进一步传布而斗争。”在耶稣会教育深深影响下的巴伐利亚,世俗政权的天主教信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反宗教改革”<sup>④</sup>在阿尔布雷希特五世

---

教势力屈服于天主教势力,但因阻力甚大无法推行,不得不在1609年7月签署了“大诏书”,承认了波希米亚新教派的合法地位,并允许波希米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sup>①</sup>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第20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58页。

<sup>③</sup>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4页。

<sup>④</sup> 据基恩·兰德尔的《天主教和反宗教改革》(Keith Randell,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London, 1990)一书,“反宗教改革”一词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到1850年才普遍使用。但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一用语遭到许多专家尤其是天主教史家的反对,他们提出了“天主教改革”一词,有的也称“天主教复兴运动”、“天主教革新运动”或“对抗新教运动”。其

公爵（1550-1579）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巴伐利亚得到贯彻”<sup>①</sup>，巴伐利亚成为天主教在德国复兴的中心。在公爵威廉五世（1579-1597）统治晚期，巴伐利亚的“人文主义以耶稣会士的风格达到了非凡的高峰”<sup>②</sup>。马克希米连统治时期，又通过战争等手段推动了天主教在南部德国的复兴。

耶稣会在巴伐利亚开展教育活动的成功不仅影响了巴伐利亚本身和德国南部，也通过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扩张，影响了德国西北部的宗教信仰。这一影响主要通过控制当地教会实现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不倦地为他的幼子恩斯特聚敛了许多兼任圣职的薪俸”<sup>③</sup>，包括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以及弗赖辛、希尔德斯海姆、列日和明斯特的大主教，恩斯特成为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大权贵。通过兼任圣职，巴伐利亚的势力向德国西北部延伸，此后近 200 年间，巴伐利亚王朝的子孙们不仅占据着科隆选帝侯的职位，而且“几乎不间断地占有列日、斯塔布洛、科隆、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帕德博恩和希尔德斯海姆等地的教会职位”<sup>④</sup>。这意味着“在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从波恩到距离北海仅几英里的这片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保证了对天主教的鼓励和推行”<sup>⑤</sup>促成了这一地区天主教的复兴。

其次，通过培养传教士和忏悔神甫影响世俗政权。关于传教士的培养及贡献，需另文阐述，因篇幅所限，本文仅简单涉及耶稣会所培养的忏悔神甫的影响。高质量的教育使耶稣会的毕业生受到了各国统治者的信赖，纷纷以他们作为忏悔神甫。据记载，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五的法国国王、斐迪南二世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希米连之后的所有巴伐利亚公爵、葡萄牙和波兰的大多数统治者、18 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都以耶稣会士或耶稣会学校毕业生作为他们的忏悔神甫。<sup>⑥</sup>作为忏悔神甫，通过与统治者的接触，在无形间影响世俗政权的宗教倾向和宗教政策，必然对维护天主教利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 三、吸引青年和异教徒，扼制新教扩张， 推动天主教复兴

耶稣会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根植于“愈显主荣”的根本宗旨，教团的所有活动都

---

实它们都是指 1550—1650 年 100 年前后天主教为维护自身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重在对新教的反击，后者重在自省性。对此，除引文中使用“反宗教改革”之外，本文作者皆使用“天主教革新运动”一词。

<sup>①</sup>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下册），第 847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848 页。

<sup>③</sup> R. B. 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 449 页。

<sup>④</sup>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下册），第 848 页。

<sup>⑤</sup> R. B. 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 460 页。

<sup>⑥</sup>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32.

服从于天主教复兴的神圣使命。对早期耶稣会来说教育只不过是实现天主教复兴、光荣天主的工具，是“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sup>①</sup>，其教育的“首要的追求就是让自己的学生们成为尊崇传统的虔诚天主教徒”<sup>②</sup>。为实现这一目标，耶稣会士像对待宗教使命一样，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投入教育事业，他们不仅“调动起自己身上全部的能量，也激发起孩子们身上全部的能量”<sup>③</sup>，将教育这一愈显主荣、复兴天主教的工具运用到了极致，产生了极为出色的效果。

首先，耶稣会学校非常重视宗教教育。1551年12月，博兰克<sup>④</sup>（Polanco）在给耶稣会全体成员的信中要求，耶稣会学校应每天留出时间祈祷、反省，每星期忏悔、领圣餐；每星期天、节日参加布道；辅助传道等。<sup>⑤</sup>17世纪70年代，波伦亚的圣露西学院学生皮特罗·安东尼奥·阿达米（Pietro Antioio Adami）的日记详细描述了学生的宗教生活：平日学校鼓励学生“出于虔诚而非强迫”早晚去参观学校教堂中的圣礼；在每间教室里有一个带有圣母像的祭坛，当学生进来时，要对她表示崇敬并在落座前祈祷万福玛利亚；每次班会以祈祷开始；早晨课结束时学生一起参加弥撒，在这期间，他们经常祈祷《玫瑰经》或《圣母玛利亚祷告》；星期六经常为学生举行灵性会议，并引导他们自省、给他们机会忏悔；学校希望学生每月忏悔、领圣餐，学生自己有时则频率更高地践行，两周一次甚至每周一次；在星期天和节日，早晨是伴有讲道的弥撒，晚上是晚祷，大多数节日常有游行和其它宗教表演。总之，这些活动给学生的宗教生活注入某种秩序和内聚力，使他们在离校后仍能继续。<sup>⑥</sup>

其次，耶稣会教育的方法与政策非常灵活。罗耀拉认为要有影响力必须首先被人接受，他经常建议会士，为“愈显主荣”必须先去适应他们的性情，并爱他们，努力争取到天主教阵营中来。这一思想被耶稣会学校运用来教育新教教徒，认为对待新教教徒首先“必须一心想着对他们宽大并真正爱他们”；“第二，争取他们的好意是必要的，这样他们可能爱我们并在他们心中为我们保留一席之地。通过亲密的交往，提及我们共同的东西，回避引起争论的东西，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sup>⑦</sup>。这种灵活的方式也体现在宗教教育上。罗耀拉认为，对非自愿者“应柔和地劝说，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不遵守而驱逐出校”<sup>⑧</sup>，不主张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活动。遵循罗耀拉精神的耶稣会学校在新教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方面作出了一定让步。如路德派学生免背圣徒连祷文（the Litany of the Saints）；根据胡斯派学生父母的要求，不准会士在信仰上责备学生，免除他们接受圣餐

<sup>①</sup> Theodore Maynard, *St. Ignatius and the Jesuits*, New York, 1956, P87.

<sup>②</sup> [法] 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sup>③</sup> [法] 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第360页。

<sup>④</sup> 博兰克，曾担任罗耀拉、莱内斯、博加三任会长的私人秘书，直到1576年去世。

<sup>⑤</sup> John W. O' 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206.

<sup>⑥</sup> Robert Birdey, *The Refresh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 129—130.

<sup>⑦</sup> Keith Randell,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London, 1990, P76.

<sup>⑧</sup> Editor: Willian J. O' Brien, *Splendor and Wonder: Jesuit Character, Georgetown Spirit, and Liberal Education*, P12.



等。<sup>①</sup>灵活的政策吸引了新教徒，很多新教父母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如荷兰曾决定对送子弟入耶稣会学校的父母施行罚款，但仍不能制止人们用假名送子弟入学；<sup>②</sup>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驱逐了耶稣会学校，但“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边境比如杜埃、蓬塔穆松和尚别里等地”的耶稣会学校。<sup>③</sup>这样，耶稣会学校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信仰，也使一些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父母。

最后，耶稣会教育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耶稣会学校招收的学生不仅仅局限于贵族和富人的孩子，也包括大量的穷人。由于耶稣会学校是免费的，不可避免地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如 1561 年，蒙雷阿尔学院有 400 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下层穷苦人。这样，“由于耶稣会士的教育活动，天主教国家的识字率上升了”<sup>④</sup>，促进了教义问答和其它基础信仰知识的普及，使天主教更深入人心。上述措施的推行是卓有成效的。通过教育耶稣会成功吸引了大批青年和异教徒重返天主教，不仅有效扼制了新教势力在欧洲的扩张，也为天主教在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地的复兴做出突出贡献。

德国是新教的诞生地，对罗耀拉来说，从新教手中夺回德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耶稣会在罗马开办日耳曼学院，作为反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利刃。罗耀拉明确表示开办日耳曼学院会成为“最安全的、几乎唯一支撑德国摇摇欲坠的和已经崩溃的教会的方法。希望许多虔诚的、精力充沛的青年被送到这里。他们将通过学习生活的榜样和坚实知识的影响宣讲福音，并通过他们的演讲，至少通过他们个人的影响，打开他们同胞的眼睛。”<sup>⑤</sup>。当时的教皇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 1550-1555 年在位）也希望日耳曼学院的学生“将会找出隐藏着的异端教义的毒素，并驳倒它，把它连根拔起，然后改种上信仰之树”<sup>⑥</sup>。

针对德国的耶稣会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位于罗马的日耳曼学院，为了更有效的对抗德国新教势力，耶稣会将它的教育活动迅速地扩展到德国本土。在这方面，迦尼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所建立的学院“不仅成为再教育的阵营，而且每个学院都成为整个地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舞台”<sup>⑦</sup>，为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和西北部、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等地的复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波兰，耶稣会士通过开办教育使宗教改革遭受重创，成为波兰天主教革新运动的

<sup>①</sup> John W. O' 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207.

<sup>②</sup>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6 页。

<sup>③</sup> [法] 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第 329 页。

<sup>④</sup> [美]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928 页。

<sup>⑤</sup> Martin D. 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147-148.

<sup>⑥</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117.

<sup>⑦</sup> Manfred Barthel,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Nark Howson,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118.

主力。在这一过程中,耶稣会的罗马学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弹射器冲破了波兰宗教改革的围墙”<sup>①</sup>。1565-1586年,大量的波兰贵族到罗马学习,其中有44人回国后担任主要的教会和世俗职务。随着与罗马联系的加强,意大利文化开始代替德国文化成为在波兰统治阶层中的主要文化。1576年,波兰国王和耶稣会结盟,成为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忠诚支持者。此后,耶稣会学校在波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波兰培养了大量传道者、忏悔神父、教师、作家,同时也培养了几代波兰主教。1576年,波兰有5所耶稣会学院,到1648年增至32所,17世纪初几乎有1万名青年男子在耶稣会学院学习。这些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毕业后或进入世俗政权和贵族阶层,或控制当地教会,他们与罗马学院培养的学生一起成为波兰天主教革新运动的中坚力量。

#### 四、结 语

伴随着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发展,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终于成功地扼制住新教的进攻,并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走上了复兴。虽然“未能重建西方的教会统一,但是它做到了至少使半个欧洲和(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使半个德国(包括奥地利)仍然信奉天主教。罗马教会在改革过程中澄清了教义,确定了对付宗教改革主要教义的界限,在欧洲面对新教形成了有抵抗危机的能力,并且通过它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入新大陆”<sup>②</sup>,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现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宗教格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天主教在这些区域的复兴中,耶稣会教育活动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的腹心,耶稣会的教育活动不仅改善了天主教的形象,扼制了新教的蔓延,而且凭借它庞大而高效的教育机器,源源不断地向新旧教斗争的前线输送营养。

总之,“在这次天主教的复兴运动中,在促使一切脱离罗马的地区和国家重新皈依正统教会方面,没有一个机构发挥的作用比耶稣会更大。”<sup>③</sup>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统计耶稣会教育在其中的份量——即教育所影响的人数和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影响广泛、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 辛 岩)

<sup>①</sup>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114.

<sup>②</sup>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第267-268页。

<sup>③</sup> [美] G. F. 穆尔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3页。